

生命悲歌与荒野坚守

——电影《可可西里》的生态叙事与人文关怀

宋梦玲

西藏大学 西藏 拉萨 850000

【摘要】：陆川执导的《可可西里》是源自真实事件的电影，巡山队员们身处可可西里的酷寒绝境，以生命、以信仰阻挡盗猎者的枪口，守护濒死的藏羚羊。影片突破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固定模式，通过真实而粗粝的镜头，将可可西里这片土地上的悲情故事搬上了大屏幕。本文将从“生态叙事的建构”“人文精神的彰显”“纪实美学的表达”三方面剖析这部影片的分量。《可可西里》讲述的不仅是守护藏羚羊，更是人与自然的拉锯以及人性在利益中的起伏。

【关键词】：《可可西里》、生态叙事、人文关怀、陆川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5.04.020

引言

1985年前的可可西里，藏羚羊是这片荒原的主人，百万之众的它们角尖顶风、蹄印遍布戈壁，伴随欧美市场的“羊绒热”兴起，大量盗猎分子蜂拥至此，疯狂猎杀藏羚羊，几年间这一珍贵物种数量就锐减至不到2万只，生存岌岌可危。1993年一支由“临时工”组成的武装反盗猎队伍深入可可西里腹地，他们既没有编制，也没有补给，拿着生锈的枪与装备精良的盗猎者斡旋。在这期间，两位队长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，最终将生命留在了雪地。

《可可西里》植根于这带血的悲剧，将荒野上的悲壮抗争搬上了大银幕。与其他聚焦环保题材的影片相比，《可可西里》不再局限于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理想化叙事模式，而是直面生态保护行动中的残酷无情。影片残酷，荒原之上有冻裂的手、饿瘪的胃，还有“救不了多少羊却偏要救”的执拗；镜头冰冷，静默着将巡山队员的挣扎、坚守、牺牲，钉成了看得见的疼。循着这份痛感，我们得以窥见文明与蛮荒的碰撞、生存与道义的纠缠，以及每一只藏羚羊与每一位巡山队员之间，那根紧紧相连的命运之绳。

1 生态叙事的建构：荒野是骨，危机是刺

1.1 可可西里：既是家园，亦是战场

可可西里并非单纯的地理背景，更是核心叙事主体，承载着多重意蕴。它是故事的中心，有自然野性的跳动，也暗藏着

人性矛盾之刀。这片土地的壮美与苍凉被开篇的航拍镜头展现得淋漓尽致：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，风沙裹挟着碎石呼啸穿行；连绵的雪山直插云霄，在阳光下折射出刺目的寒光；迁徙的藏羚羊群踏着细碎蹄声掠过荒原，与天地融为一体，构成一幅原始而肃穆的生命图景。

从生态视角看，可可西里，这片平均海拔4600米的高原如同一个精密的玻璃盒，孕育着完整却又极其脆弱的高原生态链：藏羚羊与野牦牛是真正的主人，他们藏啃食针茅，踏着冻土。极寒、极荒芜的环境下，生态链的各环节更加紧密相连，任一细微的破坏，都可能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，进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遭受悄然无声的雪崩之灾。

从人文视角看，可可西里既是巡山队的“战场”，又是盗猎者的“猎场”。风起尘飞时，是巡山队员在与不法分子追逐、搏斗；残骸遍地，是盗猎者在这片土地留下的罪恶脚印。法律与秩序在这里等同于消失，只剩下生存本能与人性贪婪疯狂滋长。此外，电影更将自然环境的残酷描述到极致：队员们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蜷缩于单薄帐篷，冻得牙关打颤；在缺氧的高原上追击盗猎者，每一步奔跑都伴随着急促的喘息；在沼泽与流沙中艰难跋涉，稍一疏忽便可能万劫不复。自然是巡山队的“盟友”，用酷寒阻挡盗猎者；自然又随时扮演着他们的“敌人”，一阵风、一捧沙就可能夺走生命。这充满张力与矛盾的设定打破了“自然是人类温情家园”的单一说法，深刻展现出生态系统的复杂本质与不可控性，使得这场守护战更具悲壮与厚重感。

1.2 危机：不是“恶”的选择，是“生存”的困局

《可可西里》在表现生态危机时不再被说教式控诉所束缚，而是通过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与细腻的细节，使观众真切感受到藏羚羊面临的生存绝境。影片一开始便直击人心：清冷月光下，数十只藏羚羊倒在血泊中，盗猎分子面无表情地熟练剥着绒皮。鲜红的血、惨白的骨与清冷的月、圣洁的雪山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残酷与神圣的碰撞让人心里一震，久久唏嘘。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——巡山队清理现场时，只剩下堆积如山的羊头骨以及阳光下闪着寒光的弹壳。尸横遍地、旷野沉寂，盗猎者已然远去，但枪声打在巡山队员们心口，贯穿灵魂。

日泰队长那句“一只藏羚羊的绒皮能卖两千块，够一个牧民活一年”精准戳穿了生态危机背后的利益链条。为获取巨额经济利益，盗猎分子不惜铤而走险。他们配备有精良的武器与先进的交通工具，而巡山队只有生锈的枪和破烂的吉普车，这场生态保卫战无疑是场悲剧。难能可贵的是，盗猎者并未被刻画为“脸谱化”的反派角色，他们贪婪麻木是真，迫于生计的无奈也是真——为微薄报酬，被迫带路、运输物资。影片中的盗猎者并非天生的恶人，而是生存困境下的牺牲品。

这种客观书写，让生态危机的根源更显复杂残酷：“贪婪”不是悲剧的全貌，人性之欲、生存之苦、地区之穷纠缠成了死结。影片以克制却有力的表达使观众深刻意识到：生态保护并非单纯的善恶之争，而是一个涉及利益、生存与道义的复杂问题。

1.3 抗争：不是“胜利”的故事，是“坚守”的史诗

影片的生态叙事以巡山队的抗争为核心。这支巡山队，由“临时工”与“志愿者”组成，他们既无编制，也无经费，甚至连基本生存物资都难以保证，仍靠着满腔热血在荒野上与装备精良的盗猎分子周旋。影片将队员们的牺牲刻画得悲壮万分：刘栋运送物资时车轮陷进流沙，推车不慎被流沙吞噬，挣扎着挥动双手，却也只剩下一顶帽子随风晃动；队员们缺吃少喝只能啃冰块喝雪水充饥，有人饿晕路边，有人脚趾被冻掉；日泰队长临终前未发一句求饶，反而质问“你们为啥要杀羊”。

巡山队的抗争从轰轰烈烈的胜利，唯有沉默而沉重的牺牲。他们一次次深入荒原出击，缴获的绒皮寥寥无几，救回的藏羚羊屈指可数，而盗猎分子的枪声早已乘着车，在旷野的另一边轰鸣。这种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坚守，既凸显了生态保护的万般艰难，也让影片的生态叙事不再局限于“保护动物”的表层，而上升为对人类文明与责任的深刻叩问。正如影片所言：“可可西里，是天堂，是地狱，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地方。”巡山队既守卫着藏羚羊的生命，也捍卫了人类生命的尊严，依靠坚定的信仰，他们浴血奋战，用生命守护另一物种的生命，以牺牲唤醒不法分子的良知。

2 人文精神的彰显：人性是疤，也是光

2.1 复杂的人性群像：善恶之外，是“活着”的底色

“非典型英雄”的塑造是《可可西里》成功的核心。巡山队员有血有肉，他们身上既有人性的光辉，也有人性的残缺：因分酬不均而起争执、在绝境时会产生退意、为求生存“劫掠”过往商贩的食物与汽油。这些看似“不体面”的细节都是能在普通人身上找到的表征。巡山队的形象真实可感，他们不是悬浮着的“英雄符号”，而是在绝境下选择坚守的普通人。

队员刘栋便是“利益与道义”这一矛盾最典型的代表。他为赚取妹妹医药费而加入巡山队，工作期间，因高原条件艰苦想逃走，也因酬劳微薄与队友争执。但在与队友并肩作战的过程中，刘栋逐渐被这份坚守打动：看到藏羚羊惨死会心痛、目睹队友牺牲会掉泪，最后他主动请求穿过危险区域运送物资，用生命实现了从“为钱而来”到“为信仰而死”的转变。

影片塑造的盗猎分子并非脸谱化的“反派”。盗猎头目马占林不是天生的坏人，他的那句“我也是没办法，我要吃饭”道尽了生存的无奈。射杀日泰之后，看着日泰尸体突然蹲地而哭，面对“同类相残”，马占林的“哭”是人类本能的恐惧。影片塑造的巡山队员们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，盗猎者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。生存压力下人性善恶并非非黑即白，善恶边界常常难以分辨。

2.2 文明与蛮荒的冲突：不是“进步”的胜利，是“平衡”的缺失

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对抗的本质是两种对立“现代性”的交锋，亦是现代文明与原始蛮荒的碰撞。盗猎分子代表“依靠技术掠夺自然”的现代性：他们凭借现代摩托、半自动步枪等装备对可可西里原始生态进行毁灭式掠夺，并借助现代贸易网络将绒皮卖到海外。这既是对自然的践踏，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背叛。

巡山队秉持着“朴素的文明意识”，他们驾的是破旧吉普、拿的是老式步枪，以最原始的方式与盗猎者斡旋。即便武器装备粗劣，时常陷入寒冷缺氧的困境，他们仍凭着坚定的信仰，用生命保护生态平衡、捍卫生命尊严。记者尕玉既是现代文明的旁观者与记录者，也是当下认知转变的一个缩影。为赚取稿费来到可可西里，他也曾质疑巡山队的行动。但在与队员们的朝夕相处中、亲眼目睹藏羚羊的悲惨境遇和队员的牺牲后，尕玉被这份坚守深深触动。尕玉态度的转变，正是现代文明对荒野守护的重新认知。

2.3 生命尊严的敬畏：不是“保护者”的优越感，是“共生者”的谦卑

对生命尊严的敬畏是影片人文内核之所在。镜头下，巡山

队员的滚烫热血与藏羚羊的孱弱生命被赋予同等重量，并无高低之分。日泰队长说：“羊和人一样，都有活下去的权利。”在可可西里这片土地上，藏羚羊是真正的主人，人和羊是共生的关系。这种认知，打破了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的优越感，彰显了“共生者”的谦卑。

日泰队长的牺牲，更是对生命尊严的极致诠释。他临终时未发求饶，只用最后一丝力气质问盗猎分子“你们为啥杀羊”，这份坚毅是其守护藏羚羊的使命，是保护生态的重任，更是对自身尊严的捍卫。影片结尾，尕玉带着记录下来的资料离开了可可西里，他写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并促使政府成立起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藏羚羊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变。

3 纪实美学的表达：粗糙是真，留白是疼

3.1 镜头语言：不是“艺术的美化”，是“真实的还原”

摒弃华丽特效与精致构图，陆川以纪实性镜头语言为核心，追求粗糙写实的影像质感。手持镜头的大量运用，加之自然的晃动感与颠簸感使观众身临这片茫茫天地并沉浸其中。刘栋陷入流沙这一场景尤为典型——从挣扎到无力，黄沙逐渐吞没他的身体，最终只剩一顶帽子留于地面。相比悲情的渲染，影片用长镜头客观、冷静地记录下这一过程，使得叙事更有冲击力，更能直抵人心。

此外，影片以冷色调为主：蓝天、白雪、黄戈壁，这些独属于荒原的意象，共同凸显出可可西里苍凉、肃穆的氛围。影

片也极少使用背景音乐，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声音：风声、雪声、藏羚羊的嘶鸣声、队员的喘息声，这些声响既增强了代入感，又成为叙事的有机部分，将可可西里及可可西里正在上演的悲剧一比一还原在影像上。盗猎时的枪声与羊鸣打破寂静，带来直击心灵的刺痛；巡山队员踏雪而行的脚步声与风声交织，更显其孤独与坚韧。

3.2 叙事结构：不是“答案”的交付，是“思考”的传递

影片的叙事结尾极具开放性，给人留下广阔思考空间。日泰队长牺牲后，尕玉带着资料离开了可可西里，他的报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并推动了自然保护区的设立。然而，影片并未交代盗猎者的结局和明确藏羚羊的后续命运。盗猎者是否已被绳之以法？藏羚羊是否脱离了被屠戮的困境？这些一无所知。但影片开放性的叙事结尾暗含着我们：生态保护从没有短暂的胜利，只有久久为功的持续抗争。即便有政府介入、保护区落地，盗猎行为也难以即刻根除，守护藏羚羊、守护可可西里的道路，依旧道阻且长。

4 结论

《可可西里》运用纪实的艺术手法，营造了一个充满悲壮与力量的生态叙事空间。它用粗糙的镜头、鲜活的人、真实的痛楚编织了起生态叙事的骨，温暖了人文精神的魂。影片讲述的是藏羚羊的命运、巡山队员的鲜血，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——自然不单是资源，人和自然本就是命运共同体，守护自然也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王万尧.一曲生命的赞歌——从叙事学角度试评《可可西里》[J].电影文学,2005,(03):10-11.杨青.电影《可可西里》的死亡叙事与人性张扬[J].电影文学,2013(22):78-79.
- [2] 高圆,张琰.解读《可可西里》中原生态美学[J].电影文学,2014(20):82-83.
- [3] 张鹏.生态文明的呼唤——《可可西里》的精神内蕴[J].电影文学,2008(06):53.
- [4] 杨青.电影《可可西里》的死亡叙事与人性张扬[J].电影文学,2013,(22):78-79.
- [5] 许芳,饶娅焯.浅谈陆川电影《可可西里》中的细节处理及其作用——用生命诠释道德、情感、信仰[J].戏剧之家,2017(04):133-134.
- [6] 高力.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——关于电影《可可西里》的话题[J].电影文学,2005,(02):16-17.
- [7] 王莉丽.《可可西里》彰显“生态电影”传播空间[J].北京电影学院学报,2005,(01):72-75+105-106.
- [8] 徐静.从《可可西里》探究原生态美学艺术[J].电影文学,2013,(05):30-31.
- [9] 尹瑾.个体与群像的交相辉映——《可可西里》耐人寻味的艺术形象[J].电影文学,2012,(14):87-88.